

苏区干部好作风是怎样炼成的

中央革命根据地,位于赣、闽、粤三省交界处,是1929年初毛泽东、朱德率领红四军从井冈山下来后逐渐开辟的。在这块革命根据地上,1931年11月7日于瑞金正式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,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的局部执政历史,因此这里也被称为中央苏区。在物质条件十分匮乏的环境中,苏区干部依靠严明的纪律、优良的作风,赢得了群众爱戴和拥护,留下了许多流传至今的佳话。

“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”

深入调查研究、坚持实事求是,是苏区干部最重要的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。这其中,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谆谆教导和率先垂范起到了很大作用。针对党内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、将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,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深入农村进行调查,先后撰写发表了《寻乌调查》《兴国调查》《长冈乡调查》等调查报告。在他的倡导影响下,从1929年到1932年春,中央苏区各级干部兴起调研热潮。

兴国县干部深入基层了解情况,体察群众疾苦,寻找问题根源,实事求是地予以解决。他们坚决执行党的土地政策,分土地给广大农民,使他们得到切实利益;组织耕田队、劳动互助组帮助群众生产,增加土地的产量,改善群众生活。他们还把解决群众穿衣、吃饭、住房、柴米油盐、读书上学、求医问药、交通出行、婚丧嫁娶等日常问题当作重要工作。比如,夏荒时乡政府立即从外地掣了米来救济广大群众,赢得了人民的衷心拥护。据统计,土地革命战争时期,

兴国县23万人口中,参军和支前作战的有9万余人,其中牺牲2.3万余人。

工作上高标准、生活上低要求,是苏区干部好作风的鲜明特征。他们与群众同甘共苦,“有盐同咸,无盐同淡”。苏区干部没有薪金,只有伙食费,每月节省一点儿伙食尾子(余款),用以剃头和交纳党费。

为了支援革命战争,当时很多干部是自带粮食办公。1934年春,为克服困难、节约经费,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带头不要公家发伙食费,从家中背米办公。中央红军主力长征离开苏区后,在一次战斗中游击队被打散,刘启耀与组织失去联系。他身上虽背有一大包充作党的活动经费的金条,但在找寻组织途中即使沿路乞讨,也从未动用丝毫党的经费。

苏区时期还实行“星期六义务劳动日”制度,干部们帮助群众或红军家属生产,极大地密切了干群关系,解决了红军指战员的后顾之忧。

为保卫、建设和发展苏区,苏区干部在政治学习、军事训练、参军参战、遵纪守法、购买公债、发展生产、移风易俗等方面都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,机关干部、广大党员带头报名参军,甚至整个党支部、团支部都积极响应,带动苏区各县群众都行动起来。据不完全统计,在参军参战方面,仅中央苏区扩大的红军就达30多万人。

1934年1月27日,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夸赞“兴国的同志们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,值得我们称赞他们为模范工作者”,还特别书赠“模范兴国”4个字。

“生不投降,死不叛党”

坚定的理想信念,是苏区干部好作风产生的内在根源。

江善忠,兴国县长冈乡合富村人,22岁秘密加入农会,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先后担任乡苏维埃政府主席、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裁判部部长。他对党忠诚、立场坚定,除恶肃奸不留情,反动分子听到他的名字胆战心惊。1934年10月,红军主力离开苏区后,凶残的敌人对群众进行血腥报复。江善忠率队进山打游击,经常带人在深夜潜入最嚣张的反动分子家中,予以镇压。反动派对他恨之入骨,悬赏500块大洋要他的人头,但是江善忠机智勇敢,巧妙地与敌人周旋,敌人始终未能得逞。

1934年底的一天上午,江善忠接到地下交通员报告,敌人大队人马向藏有红军伤员的石门寨扑来。情况万分紧急,为了拖住敌人,给伤员转移赢得时间,江善忠毅然将追兵引到了山上的绝路。他提着双枪边打边撤,一路攀上棒槌峰,利用岩石作掩护,打击追敌。子弹打光了,他就用石头往下砸,砸得敌人不敢上前一步。很快,山顶上能搬动的石头也都砸光了。敌兵慢慢逼近,想活捉他这个“大官”,去领取500块大洋的赏金。江善忠放声大笑,从容不迫地跳下了悬崖。第二天,群众收殓烈士遗体时,发现江善忠的内衣上写着:“死到阴间不反水,保护共产党万万岁。”

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后,瑞金县委书记谢名仁留在苏区坚持打游击。他鼓励大家:“地上的雪再厚,也有融化的时候;不管环境再恶劣,革命总是要胜利的。同志们,考验的时候到了,为着苏维埃,为着革命成功,哪怕只剩下一人一枪,也生不投降,死不叛党!”1935年3月,谢名仁不幸被俘后惨遭杀害,年仅28岁。

“关心群众生活,注意工作方法”

苏区干部在工作中时时处处体现着舍小家为大家的思想觉悟。曾任中共兴国县委书记的胡灿,在1931年国民党军队烧了他家房子后,写诗

安慰悲伤的妻子:“房子烧了不要紧,只要人在值千金。共产主义定实现,阶级仇恨永记心。”逃跑敌人后,胡灿兴建了3间简陋的土坯房。人们劝他盖个好点儿的房子,他摇头谢绝,毅然在门楣上镶嵌一块亲题的石匾“也是居”,以示共产党人甘居陋室、胸怀天下之情怀。

1933年11月,毛泽东在中央政府秘书长谢觉哉陪同下,率领中央政府检查团来到兴国县的模范乡长冈。毛泽东等人脚穿草鞋分头访问群众,还帮助群众挖番薯、刨花生、种油菜。一天,在从群塘往火叉塘走的路上,毛泽东遇到红军家属刘长秀,便和蔼地问:“大依嫂,去哪里呀?家中有几个人吃饭?”刘长秀说:“丈夫和长子都当红军去了,家中还有一女一小崽。春上,家里无米,乡政府便从公略县办米来接济我家。早几日,女儿生疖子,乡卫生员便送药上门。共产党真是好,什么事情都替我想到了……”

毛泽东又来到贫农马荣海家。马家的房子不慎失火烧了一间半,乡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昌宝通过乡互济会拨给他们6吊钱,再发动群众捐工捐料,仅3天就帮盖了新房。看到新房,毛泽东很高兴,连声称赞:“乡干部做得对,苏维埃干部应当十分关心群众生活,群众才会把革命政权当作自己的生命。”

谢昌宝还很善于从工作实践中归纳总结经验,提出了著名的“十带头”和“四模范”。“十带头”为:带头学习政治、军事;带头遵守党的纪律;带头参军参战;带头生产劳动;带头执行勤务;带头购买公债;带头节约粮食支援红军;带头优待红军家属;带头慰问捐献;带头集股办合作社。“四模范”是:做扩红的模范、干部作风的模范、土地革命的模范、经济文化建设的模范。

毛泽东把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基本内容概括为“关心群众生活,注意工作方法”。他称赞长冈乡干部:“他们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真心实意的爱戴,他们的战争动员的号召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。要得到群众的拥护么?……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。”

据《文史精华》孟红/文

任弼时在延安夺“纺纱状元”

任弼时一家与纺织有不解之缘。妻子陈琮英曾在长沙做过纺织工,堂叔任理卿则是著名的纺织专家和纺织教育家。

抗战时期,由于国民党的严密封锁,“不准一斤棉花、一粒粮食、一尺布”进入边区,延安物资异常匮乏。为打破封锁,解决缺衣少食问题,党中央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。身为中共中央秘书长的任弼时,对大生产运动抓得事无巨细。他这个中央“大管家”,甚至找359旅(原红6军团)要来一部纺车,仔细琢磨怎样改进它。任弼时只要有空,就像一个老把式一样,盘腿而坐纺起纱来。经刻苦练习,他的纺纱技术日渐提高,在边区领导中已很有名气了。

1943年3月的一天,杨家岭一派热闹景象,原来是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警卫团在窑洞前举行纺纱比赛。约200辆纺车,排成整齐的几列,周恩来、任弼时、李富春等中央领导人笑容满面地坐在纺车旁。一声哨响,比赛开

始,纺车“嗡嗡”声四起。任弼时一手熟练地牵线,一手快速地摇动纺车。白棉线在他久历风霜的手里,如泉眼流水,绵绵不断而又均匀地流出。即便腰酸背胀,额头微微冒汗,他也无暇停下来休息,迅速地转着纺车……又一声哨响,纺车全部停下来,纺手们纷纷展示自己的劳动成果。经评委认真鉴定,任弼时纺的纱线粗细均匀且很少有分叉,为最优等,获“纺纱英雄”称号,列第一名。年长一些的周恩来也获“纺纱英雄”称号,列第五名。

在任弼时等中央领导的带动下,延安各界掀起了纺纱比赛的高潮,促成了大生产运动中你追我赶的局面。毛泽东也在杨家岭窑洞下开垦出一块菜地,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则组织了一个生产小组,垦地种菜3亩。经过军民艰苦努力,边区的经济条件大为好转。任弼时的老部队359旅,更是把荒凉无比的南泥湾,变成了庄稼遍地、牛羊成群的“陕北好江南”。

据《党史博览》刘国辉/文



富强 民主
文明 和谐
自由 平等
公正 法治
爱国 敬业
诚信 友善

图说
核心价值观

节俭传下去 中国万年福

河南舞阳 张新亮作

中宣部宣教局 中国文明网